

戰爭遺緒與創傷敘事： 論海外華文女作家黃美之 散文書寫的主體形構*

羅 詩 雲**

摘 要

「戰爭」是理解近代東亞社會的重要線索，戰時社會的後方經驗涵蓋了社會動員和日常場域等大眾生活，生活場域亦關涉「意識戰」的實踐與效應，戰場前線和戰場之外的後方社會實無法分論。且戰爭促發了國境空間、身分認同或是人群地域流動等近代衍變，連帶出主體意識、身分感或思想活動的重新形構。而戰後臺灣社會文化的生成，亦須省視中日戰爭乃至國府統治臺灣的「戰時中國」情境樣貌，包括社會後方生活與記憶政治的文學詮釋。鑒此，本文鎖定具有中國、臺灣兩地生活經驗與政治受難者身分的海外華文女作家黃美之（1930-2014）為個案，就其戰後散文展開討論，探求「戰時中國」的戰爭遺緒及其致使的成長創傷，析論作家生命記憶與文學重述間的關係。即追索具有戰時經驗的作家身體／身分之移動、拆解及重構問題，及其如何與戰後臺灣的社會內戰語境互為作用，揭示自中國渡海來臺世代的離散書寫與主體形構。

關鍵詞：黃美之、戰爭、社會內戰、創傷敘事、主體

2024.04.30收稿，2024.10.18通過刊登，2024.10.25修訂稿收件。

* 本論文為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戰時中國』再現：終戰後自中國來臺、返臺作家的戰爭敘事與青少年創傷」（計畫編號：NSTC 112-2410-H-004-177-MY2）的部分研究成果，論文初稿先前曾於2023年12月9日發表於澳大利亞中國研究協會主辦之「Chinese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CSAA) 18th Biennial Conference 2023」。

**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War Legacies and Trauma Narrative: Exploration of Subject Construc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Female Writer Huang Meizhi's Prose Writing

Lo, Shih-Yun*

Abstract

“War” is an essential clue for understanding modern East Asian society. The frontline of the battlefield and the rear society outside the battlefield are inseparable. The wartime experience of rare society encompass social mobilization and daily life, with sphere of everyday life closely tied to the practice and effects of “ideological warfare.” War intensified the modern evolution of border space, identity, and regional mobility among East Asian, reshaping subject consciousness, identity configurations, and ideological activities. The formation of Taiwan’s post-war social culture must also take into account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and the legacy of “wartime China” under Nationalist rule, including its influence on population movements, wartime experiences, and memory politics. Accordingly,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essays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female writer Huang Meizhi (黃美之, 1930-2014), who experienced life in both China and Taiwan and was a political victim. It explores the cultural shifts of “wartime China,” the growth trauma they caused, and the intertextuality between the writer’s life memory and literary representation. This analysis seeks to trace the movement, disintegr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body/identity of writers with wartime experience outside Taiwan. It further examines how these identities interact with the post-war social and civil war

* Assistant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context of Taiwan after their arrival, uncovering diasporic writing and the subject construction of “wartime China” generation.

Keywords: Huang Meizhi, war, social civil war, trauma narrative, subject

一、前言：戰爭離散下的女性敘事

臺灣近代社會的形成與戰爭的延續息息相關，需併同觀照戰後復員的歷史階段。¹ 由國家和社會面對個體存在的共謀角度，1945年的終戰並未終結戰爭所啟動的政治、社會和軍事管理。中國境內的階級戰爭與接管臺灣後的國民轉化，等同於社會大眾的意識與肉體上持續戰爭動員。² 在持續的國族生存壓力下軍事治理已成常態，顯影於社會內部競逐和個體生存的營為。換言之，戰後國民黨政府在臺灣的準戰時體制實是社會內戰的進行式，也是「戰時中國」在島嶼臺灣的延續，戰爭之框以另類形式存在並影響大眾生活和歷史發展。³ 關於戰時認知建構的討論，研究者汪宏倫認為當代臺灣的戰爭識框並存著大東亞戰爭之框、抗日戰爭與國共內戰之框、反抗外來政權與反侵略／併吞的戰爭之框。⁴ 因為戰爭之框是雙向作用的認知型態，戰爭所形塑的結構框架則可對應於戰爭期世代看待社會與自我的方式，含納了時代意識與主體形塑的討論。

¹ 戰後臺灣民主化的過程實是對中日戰爭與國共內戰之戰爭識框的同時拆解。汪宏倫，〈第三章 東亞的戰爭之框與國族問題：對日本、中國、台灣的考察〉，汪宏倫編，《戰爭與社會：理論、歷史、主體經驗》（臺北：聯經出版，2014），頁202-206。

² 軍事治理在戰後臺灣的蔓延必須考量社會場域的需求與共謀，包括政治統治和社會支配、自我看管的技術。黃金麟，〈第六章 共謀性的治理〉，《戰爭、身體、現代性：近代台灣的軍事治理與身體1895-2005》（臺北：聯經出版，2009），頁218-230。林果顯認為國民黨控制下的中華民國從未脫離戰爭狀態，戰後的戰時體制構築於抗戰國家總動員和反共內戰動員戡亂所構成的法律體系，1945至1949年臺灣在法理上維持戰時體制。林果顯，〈戰後臺灣的戰時體制（1947-1991）〉，《臺灣風物》58卷3期（2008），頁135-146。

³ 本文所論之「戰時中國」，意指自中日戰爭（或言「抗戰」）、國共內戰乃至國府1949年底遷臺後治理的後方社會備戰情境，蘊含戰爭遺緒的問題意義。

⁴ 汪宏倫引述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戰爭之框」（frame of war）的認識論框架以討論二戰臺籍戰犯的問題，「戰爭之框」解釋了戰爭進行中社會規範如何再現暴力與苦痛，透過對暴力「有所選擇且區別」的框架來規範社會在情感與道德方面的處置，即界定誰是不值得或者應該關心的對象。汪宏倫，〈第三章 東亞的戰爭之框與國族問題：對日本、中國、臺灣的考察〉，汪宏倫編，《戰爭與社會：理論、歷史、主體經驗》，頁197-210；藍適齊，〈第七章 可悲傷性，「戰爭之框」與臺籍戰犯〉，汪宏倫編，《戰爭與社會：理論、歷史、主體經驗》，頁396-397。

本文研究對象黃美之（1930-2014），湖南長沙人，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歷史系、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肄業。1949年來臺求學，爾後擔任孫立人將軍祕書、女青年大隊生活輔導組副組長。1950年與姐姐黃珏因孫立人案牽連，被以「過失洩漏職務上所知悉之軍事機密消息」的罪名囚禁十年，為戰後臺灣白色恐怖的受難者。⁵獲釋後，任國立復興電臺編輯、內政部勞工司國際勞工組員。1963年離開臺灣，隨美籍外交官夫婿出駐亞非各地；1972年定居美國，在加州郵局服務多年後退休，曾任北美洛杉磯華文作家協會副會長。2001年，黃美之用政府賠償的冤獄補償金，在洛杉磯成立德維文學協會，促進海外華文文學的活動，是海外華文女作家協會、世界華文作家協會成員。依作家自述與文友記憶，她自小喜愛寫作，高中時即以中篇小說獲全國青年寫作獎項。一九六〇年代投身創作，1965年寫作首篇小說〈生命的奇幻〉，創作文類主要為散文和小說。作品發表於臺港星馬及美國華文報刊，可見其文學發表場域廣度與戰後華文文學的跨界連結。⁶

作家著作依出版時間排序，散文類包括遊記《八千里路雲和月》（1979）、散文《傷痕》（1994）、《不與紅塵結怨》（1998）、《歡喜》（2000）、《深情》（2002）、《馬丁尼酒與野火》（2011）等，除書寫個人生命際遇與時代見聞，亦抒發旅外的遊子情懷；小說集僅有《沉沙》（2005）、《烽火儷人》（2009），兩書收錄篇章略有重疊，以動人

⁵ 研究者將白色恐怖時期劃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是從1947年2月到1948年底的武裝鎮壓，以二二八事件中領導或參與協商的菁英階層、參與群眾為鎮壓對象。第二階段從1949年底國府遷臺，至1950年代末期為止。主要執行者是情報機關特務人員，共黨潛伏分子和臺獨分子是主要鎮壓對象。侯坤宏，〈戰後臺灣白色恐怖論析〉，《國史館學術集刊》12期（2007），頁142-144。

⁶ 發表刊物包括：《皇冠》、《中國時報》、《中央日報》、《自立晚報》、《青年日報》、《中外雜誌》、香港《明報月刊》、《星島日報》、馬來西亞《蕉風》、《中國報》、美國《美國世界日報》、《美國論壇報》、《美國國際日報》、《美國世界周刊》等。黃美之生平與創作歷程，參見李瑞騰編，〈黃美之〉，《2014台灣文學年鑑》（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5），頁148；朱浚源、吳美慧訪問，吳美慧紀錄，〈黃正女士訪問紀錄〉，陳三井、朱浚源、吳美慧訪問，吳美慧紀錄，《女青年大隊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頁71-84；明鳳英，〈不與紅塵結怨的烽火儷人——黃美之〉，《她們的時代：民國女子訪談錄》（臺北：釀出版，2020），頁195-203；張鳳，〈思念烽火儷人 黃美之〉，《北美華文作家協會》，https://chinesewritersna.com/review/?page_id=20250（2024.4.24徵引）。

筆調，道出戰亂中青年世代的流散苦難。歷史學出身的黃美之，寫作面向囊括旅遊行腳、人物憶舊、成長懷鄉、冤獄悲情、生活感觸等性質。以散文而言，屬在臺政治冤獄的心路歷程記述最令人留意，刻劃被國家排除在外且受壓抑忽視的主體面貌。關於黃美之的前行研究，散見於戰後臺灣白色恐怖的論述，鮮有從文學角度剖析其作的專論。她的散文寫作具濃厚自傳意味，概以己身經歷出發，帶有現代性殖民離散情境與記憶創傷之敘事圖景。⁷ 趙淑俠〈淺談黃美之的《傷痕》和王仙的《情之鍾》〉評述《傷痕》以回憶與敘述往事為主軸，呈現個人傷痕和歷史面貌；張錯〈回眸〉將黃美之敘事劃分虛實交錯的虛構層面與禁錮回憶的現實層面；趙彥寧〈流放的政權與流亡的身體：論五零年代公領域中的主體、物、與性／別〉由流亡身體與物品依附的關係解析黃美之散文，表述了主體與物的互構；明鳳英《她們的時代：民國女子訪談錄》集結1949年前後來臺女性文壇作家的訪談記錄，收錄黃美之接受專訪並親自修改稿件的記錄，呈現民國女性的時代心境與中國社會樣貌。⁸

本文選擇在中國、臺灣先後歷經「戰時中國」情境的海外華文女作家黃美之為個案，就其中日戰爭乃至戰後臺灣一九五〇年代的經歷記述，析論此間成長主體與內外型態戰爭的相互作用，包括民國記憶、身分形構與政治禁

⁷ 離散論述可劃分為傳統離散、現代性殖民離散、當代全球化離散之三階段演變，黃美之屬第二階段「現代性殖民離散」，其指向帝國殖民暴力所造成的人類集體離鄉現象，形成長期居留宗主國或異鄉的離散族群。賴俊雄，〈當代離散：差異政治與共群倫理〉，《中外文學》43卷2期（2014），頁13；英國社會學家魯賓·柯恩（Robin Cohen）將離散社群形式分為受害者、勞動力、貿易買賣、帝國、文化等五類，此分類未限於特定歷史時期。離散指涉了一跨國的形式、形構與過程，同時鬆動了文化與知識結構的疆界，可廣義應用於戰前東亞大眾越境移動的討論。黃美之終戰前後的離散情境是為「現代性殖民離散」階段的延伸。離散的傳統模式與社群形式，參見卡爾（Virinder S. Kalra）、柯爾（Raminder Kaur）、哈特尼克（John Hutnyk）著，陳以新譯，〈返鄉與離鄉：離散的社會組構〉，《離散與混雜》（臺北：國立編譯館，2008），頁15-21。

⁸ 趙淑俠，〈生命是往前走的——淺談黃美之的《傷痕》和王仙的《情之鍾》〉，《明道文藝》253期（1997），頁158-162；張錯，〈回眸〉，《聯合報》（2012.11.16），D3版；趙彥寧，〈流放的政權與流亡的身體：論五零年代公領域中的主體、物、與性／別〉，何春蕤主編，《性／別政治與主體形構》（臺北：麥田出版，2000），頁79-97；明鳳英，〈不與紅塵結怨的烽火麗人——黃美之〉，頁161-206。

錮等後方敘事。正是因為黃美之的生命敘事展現戰爭的認知框架，回應了戰後臺灣對中日戰爭與國共內戰之戰爭識框的拆解，從而表現主體去疆域化的認同衝撞與書寫生產性。敘事考察由中日戰爭以降及其後的復員生活論起，也是緊扣作家成長記述的起點。對照黃美之1963年後旅外經歷，及其以臺港星馬、美國華文報刊為發表場域的活動，海外文學亦在一九六〇、七〇年代臺灣文壇崛起，生發出身分建構議題的移民文學、政治性強的保釣文學。⁹一九六〇年代海外華文女作家的發表場域亦散布於臺港星馬，如聶華苓、於梨華、叢甦、陳若曦、歐陽子等人，相關研究框架包括留學生文學、離散文學、現代主義、亞美文學等脈絡。同具冷戰離散下身分意識、家國思考及跨國移動經歷的黃美之，其文學實可與聶華苓的自傳性書寫相互參照。然黃美之的作品卻未如前述作家般於戰後臺灣文壇被討論，遲至一九九〇年代始在臺發行文集，並出現評述短論。這種遺世獨立的殊異狀況，或許緣於她敏感的白恐受難者身分、未出版文集，以及傾向敘寫中國戰爭離散與在臺政治受難經歷的題材有關，而未獲當時臺灣文壇及其後臺灣意識崛起的文化界所注目；1994年黃美之以《傷痕》此作現身臺灣文壇，可歸因於此際臺灣民主化改革，讓她無畏重述白恐的失落記憶，更彰顯作家生命與臺灣歷史的相縛性。¹⁰

黃美之散文作為陳述創傷的載體，表達去國離鄉處境中之生存狀態與時代感，呈現了「戰時中國」的戰爭遺緒與流亡主體的動態互構。本文將聚焦作家與戰時情境的生存交涉，包括中國戰時生活的成長記憶與移動境遇，以及來臺後遭遇社會準戰時體制的身心禁錮經驗。藉以思索創傷記憶的再現敘事，即因戰爭離散與社會內戰所致的主體錯置乃至重新定位的自傳性散文，發揮了如何挪轉為有意義的主體建構和文化敘事。

二、民國歲月：成長敘事的逃難創傷與敘事傾向

黃美之散文的民國敘事等同於她的成長敘事，可劃分長沙原鄉、抗戰

⁹ 范銘如，〈來來來·去去去——六、七〇年代海外女性小說〉，《眾裏尋她——台灣女性小說縱論》（臺北：麥田，2008），頁127-128。

¹⁰ 「經國先生去世後，一片翻案聲，我也趕熱鬧似的，寫了『六月雪』，……我也開始覺得不能忽視那一段日子，應該有所記載。」參見黃美之，〈後記〉，《傷痕》（臺北：躍昇文化，1994），頁234-236。

時避居的湘鄉，及國共內戰時廣州中山大學寄讀生活等三部分。抗戰與內戰兩階段的敘事同見戰爭背景，然生活氛圍與主體感受卻極為不同。以下針對故鄉離返、戰時生活與移動渡航等面向，論述作家散文的成長創傷與敘事傾向。

（一）逃難的民國產品

研究者張錦忠定位黃美之是典型冷戰脈絡下的離散華人。¹¹ 因戰時離散、十年白恐繫獄，及婚後隨美籍外交官員夫婿Fleischman（傅禮士）職務旅居世界等閱歷，令她內心永存原鄉鄉愁。黃美之出版首作《八千里路雲和月》主軸即是抒發對原鄉長沙的繫念與疏離，諸篇藉物景襯寫思鄉、思親的眷戀情感，生發出歷史傷痕所刻印的愴然。作家早期遊記交織了戰時成長記憶、鄉愁情緒和客旅感懷，致使詞語與景物情感的移置錯結，同時呈現冷戰離散女性於工作、婚姻和地域之間流動的光景。

黃美之在2012年訪談中描述抗戰末期的「我」：「我想我是正宗的、貨真價實的『民國產品』。因為出生就逃難，先是國共兩黨難以互信，後是日本人的侵華，都要逃難。」¹² 戰時作家一路由長沙、湘鄉、安化、南京、廣州輾轉來到臺灣臺北、屏東等地，兒少起漂泊不定的移動，令黃美之擁有數個「故鄉」所繫處，包括出生的長沙城郊、戰時安居的湘鄉縣、入獄且成家的臺灣與住得最久的美國洛城。對她而言，「民國」是戰爭不斷的時代。戰時中國情境的不斷逃難移動，促發作家惶惑不安和自我詰問的創傷與鄉愁，對生活懷抱認知、情感的雙重不確定性。如〈火車情結〉由火車警鳴聲與奔馳敘寫展望原鄉長沙與新生意念，然戰時避居的湘鄉只見焦土戰略下挖空的鐵軌路基，遠邊夕陽像蔓延的烽火，毫無閒逸之感。群山環繞的湘鄉地處偏遠，卻仍未能逃離戰火侵襲，逃難移動不斷中止作家求學生涯。黃美之筆下中國原鄉雖未見直接的軍事對壘，但場景概被前線戰火入侵，襯托避居後方的大眾恐懼與無奈。

創傷呈現於身體或心理層面，是內在強烈的不安感或生活失序的狀

¹¹ 張錦忠，〈那陣風，吹向南方：一九五〇、六〇年代臺灣女作家在《蕉風》——謹以此文紀念黃珏、黃美之姐妹〉，《文訊》434期（2021），頁50。

¹² 明鳳英，〈不與紅塵結怨的烽火麗人——黃美之〉，頁174。

態。¹³ 如黃美之所言，戰爭逃難是她這世代民國青年的成長日常，多次與至親離別的傷感情緒及其忍受，交織出成長期不安的創傷心態。痛苦是記憶最有力的輔助，傷痕阻礙了遺忘，主體不斷承載積累戰爭離散的記憶。於是，作家進入習慣將痛苦隱藏，卻又無法全然壓抑的受創狀態：

在戰爭中成長的孩子，遠遠離開媽媽的時候似乎很多，雖然沒有清晰的情景，讓我樣樣記得，但那種離別時的淒楚，而又必須忍受，因一次又一次的重複，便跟著歲月在我心中縷織成一種朦朧的不安，也就是說，離開媽媽時那份痛楚已習慣性的隱沒，心底裡卻總蘊蓄著不安，似乎已成了一種長期的心態。¹⁴（黑體字為筆者所加）

戰爭摧毀了人們的生活方式，改變人們與其歷史、身分和生活價值相連的所有社會活動。¹⁵ 所謂「長期的心態」可視為民國青年的感覺結構，置身在戰禍連年近代中國生活的世代感，也是作家對事物意義的詮釋框架，回應戰爭遺緒對個體感知的形塑。結合黃美之的訪談記錄，可知民國社會整體共同感受的結構情緒與價值觀，尚包含吃苦耐勞的精神與及時行樂的悠然。¹⁶ 躲避戰禍暫居湘鄉的日子猶如與外界隔絕的安詳時光，但離家至遙遠他鄉求學的艱苦卻又時刻提醒作家抗戰時局的激烈，以及離別至親時的精神負荷。

中日戰爭結束後中國旋即陷入國共內戰，戰爭將個人、家庭、政府和學校以不同方式流離失所，改變人們對世界的想像。時為大學生的黃美之生活清苦且前景惘然，雖擔憂時局混亂卻又無能為力，逃難是唯一可行的選擇，或者是戰時中國後方大眾的宿命：

我是匆忙的不是十分有把握的離開了大陸中國，只因共產黨已到了上海，便承攬了中國人的宿命——逃難（出站），坐著一艘前清留下的船

¹³ 彼得·列文（Peter A. Levine）著，周和君譯，〈創傷面貌的轉變〉，《解鎖：創傷療癒地圖》（臺北：張老師文化，2013），頁54-55。

¹⁴ 黃美之，〈離開媽媽的時候〉，《不與紅塵結怨》（臺北：躍昇文化，1998），頁20。

¹⁵ 蕭邦齊（R. Keith Schoppa）著，易丙蘭譯，〈前言〉，《苦海求生：抗戰時期的中國難民》（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2016），頁6。

¹⁶ 明鳳英，〈不與紅塵結怨的烽火麗人——黃美之〉，頁179。

來到台灣，因為在海上漂了三、四天，當船到達基隆時，我是腳也站不穩的搖搖擺擺上了岸，我的同伴被家人接去，我只知道要去臺北……。¹⁷

1949年後戰爭轉為社會體制內的延續，將中國渡海來臺的離鄉變為無法歸返的眾生鄉愁。黃美之形容青年們面對一個逃難的大題目，逃離的不僅是故鄉空間，還有斷離既有身分、生活環境與社會關係。面對已成空城的南京，短促動盪的廣州生活，黃美之深知離開中國是必要的。依據作家訪談記錄，當時的她只剩去美國或者臺灣的選擇，想繼續求學的黃美之規劃先到近處的臺灣，於是借用親友姐姐名義登記入境。¹⁸ 1949年5月的渡臺歷程，從決定離開、與親人告別到乘船赴臺期間的情緒，黃美之由輕鬆、新奇逐漸轉為苦悶不安，孤獨感愈加沉重，但亦知隻身赴臺已是騎虎難下的選擇。

決定赴臺後也非就此安寧順遂，連日顛簸的愁渡船旅令人不適，異地實感更提醒作家離開原鄉及其人際連結的現實焦慮。投奔親友的作家途經市府監牢，眼見牢內人拚命揮手的情景，事後驚覺這可笑場景竟是命運的暗示：「我扯下車簾看，只見對街樓上是監牢，犯人都擠在鐵欄後看街，還向我招手，……後來竟坐入了秘密監牢，這可真是入站了。」¹⁹ 戰時中國的亂世彷彿緊迫作家不捨，一同渡海來到臺灣，此際被迫與親人的分離再次召喚自小戰亂離家的淒楚不安。黃美之傾訴了戰時成長的生命傷痕與移動經驗，此創傷更隨她戰後來臺所遇之政治災難強化。無論是1949年依親來臺或是1963年婚後離臺的漂泊，其實都是國家暴力迫使作家做出選擇。特別是來臺後任職國防部女青年大隊的黃美之，懷有深刻的中國國族認同，卻因當局派系鬥爭被構陷繫獄十年。戰後國族認同與安穩生活的雙重挫敗，加之戰爭成長經驗的創傷共同形成作家的離散生命情境。

1973年起黃美之雖定居美國，卻持續遊歷世界，可知心志習性已不脫天涯移動的追求。首部出版作即遊記《八千里路雲和月》，其他散文集亦多

¹⁷ 黃美之，〈文化爭戰〉，《馬丁尼酒與野火》（臺北：躍昇文化，2011），頁72。

¹⁸ 朱浚源、吳美慧訪問，吳美慧紀錄，〈黃正女士訪問紀錄〉，頁72-73。訪問時間為1992年11月20日，地點在臺北市新店中興路徐宅。

¹⁹ 黃美之，〈文化爭戰〉，頁72。

收錄旅遊雜文，甚至自成單元。²⁰ 中年落腳洛城的黃美之，身心始終存有對鄉關何處的探問，她自述：「禮士說我們兩人一生中都是在柏城住得最久，柏城應該是我們的家鄉。這陡然令我面對一份陳舊的心結：『我的故鄉在那裡？』」²¹ 這種探問原鄉何處的創傷心理，亦見旅記行文對內心故鄉與旅地風物的不斷比對，如〈東非的肯亞〉以東非的維多利亞湖旅程，對照自言是第二故鄉臺灣日月潭，以及第一故鄉湖南的洞庭湖。黃美之婚後持續的行腳遊歷，或許是一趟無止盡的尋找自我之旅：「我似乎很難放棄我對漂泊特有的一種理念，似乎是一種去證明自己存在的方法。」²² 漂泊不定是她存在的自我證明、心靈解放的渴望，同時也是背負戰時中國生存情境傷痕的回饋機制，回應鄉關何處的錯位經驗和戰時成長離散的不安心結。

（二）戰火外的青春桃源

躲避戰禍與家人移居偏鄉的生活樂趣，以及時局動盪下學生罷課、教授罷教的學潮，彷彿掩蓋了外界的戰鼓聲，形成遠離戰火偏安的成長空間：「抗戰末期，真是烽煙匝地，但我的家、我的學校，似都在砲火的死角地帶，山清水秀的有如世外桃源，弦歌不絕」，²³ 引文的「家」意指湘鄉，「學校」則指中學寄宿時期，兩者共組戰時烽火青春桃花源，相關敘事另表現出作家戰時記憶的心理失衡與追求。²⁴ 除了湘鄉山村中學寄宿通勤，南京、廣州的大學寄讀生活也是作家戰時民國敘事裡最快樂、純粹的歲月：「我們可真玩得把漫天的烽火、動地的戰鼓聲全都不見不聞了。」²⁵ 時為學

²⁰ 作家散文《傷痕》卷三「邊走邊瞧」，收錄18篇旅記；《不與紅塵結怨》卷三「山水」，收錄6篇旅記；《馬丁尼酒與野火》卷五「雲水」，收錄12篇旅記；《歡喜》、《深情》二冊散文集雖未有旅記單元，仍見旅遊性質所寫雜文。

²¹ 黃美之，〈眉眼盈盈處〉，《歡喜》（臺北：躍昇文化，2000），頁233。黃美之的遊記雜文寫作呈現「家」對離散者而言，並非穩固不變的狀態，但是家鄉本質卻預設不變。卡爾（Virinder S. Kalra）、柯爾（Raminder Kaur）、哈特尼克（John Hutnyk）著，陳以新譯，〈返鄉與離鄉：離散的社會組構〉，頁29-32。

²² 黃美之，〈漂泊系列〉，《馬丁尼酒與野火》，頁175。

²³ 黃美之，〈時代的腳步〉，《深情》（臺北：躍昇文化，2002），頁20。

²⁴ 研究者觀察戰時豐子愷、金錫輝等人日記敘事均出現可讓人逃離恐懼的桃花源形象，或者選擇相信契合生存心態的流言，顯現戰爭所引發的心理失衡問題。蕭邦齊（R. Keith Schoppa）著，易丙蘭譯，〈苦日子〉，《苦海求生：抗戰時期的中國難民》，頁97-119。

²⁵ 黃美之，〈看海〉，《深情》，頁106。

生的她故意將注意力偏離晦暗的戰爭，只顧專心學習或與友人同遊。旅美作家夏小舟認為黃美之散文是敘舊的，展示時代的苦樂截面：「民族苦難歲月中頑強求生的各色各樣的辛酸人生，或辛酸人生中的小小快樂。」²⁶ 其散文非盡訴苦難，而呈現戰亂年代的鮮活生命與風景，苦樂參半，反襯出民國苦難圖景的生存之道。如〈山洪暴發的時候〉描繪抗戰時鄉趣十足的青春生活，年少的作家不畏雨後突來的山洪水勢，與友人橋邊洗髮的天真爛漫；或如〈伊朗事件〉描述金陵女大如象牙塔，報紙新聞盡是戰事消息，讓身為大學生的她深感無能為力，於是沉浸纏綿優雅的電影廣告文字。²⁷ 在民國的戰時情景中，作家反倒有意識的將生活逸離戰局，呈現對自我生存的某種心理保護，營造宛如桃花源的意識棲身之所。²⁸

作家的戰時民國記憶除了逃離戰局的求學玩樂，回望故鄉物景與人事過往是另一敘事圖式。〈山山難忘〉刻劃返家必經的山嶺存在盜賊出沒的畏人傳聞，但對流散多時的黃美之而言，故園山嶺的任一景物都是成年後鄉愁情緒的象徵物：「當何處是兒家也不清楚分曉的時候，悵惘的心中，總會記起那一副紅色門聯，所以真正並不能把暗山忘記。」²⁹ 步行山嶺的回憶看似發乎自我定位與故鄉何在所形塑的物景，但內裡蘊含尋求亂世之安居地的情懷。於此，一則顯現作家基於無法歸返的心理狀態所產生的土地依戀，一則體現與原鄉記憶聯繫的象徵運作。³⁰ 中國近代史學者蕭邦齊（R. Keith Schoppa）針對戰時中國難民敘事，提出中國人在遠離故土和群體關係的時刻，其思慮往往是更地方化、追求個人安定的，而非民族感情。³¹ 引文的小

²⁶ 夏小舟，〈序 心底無私天地寬〉，黃美之，《歡喜》，頁8。

²⁷ 黃美之，〈山洪暴發的時候〉，《不與紅塵結怨》，頁12-19；黃美之，〈伊朗事件〉，《深情》，頁33。

²⁸ 張錦忠分享己身經驗與創作，指出離散族裔往往在尋找家園或政治的桃花源，促發創作具有桃花源意象。李有成、張錦忠，〈在文學研究與創作之間：離散經驗〉，《思想》17期（2010），頁80。

²⁹ 黃美之，〈山山難忘〉，《不與紅塵結怨》，頁177-178。

³⁰ 所有形式的移民經驗都具有程度不等的強迫性，歸返障礙促使離散者對離開的土地有所依戀，這種與原鄉的聯繫感作為強烈的象徵運作。卡爾（Virinder S. Kalra）、柯爾（Raminder Kaur）、哈特尼克（John Hutnyk）著，陳以新譯，〈返鄉與離鄉：離散的社會組構〉，頁17-18。

³¹ 蕭邦齊（R. Keith Schoppa）著，易丙蘭譯，〈鬼哭神嚎的世界〉，《苦海求生：抗戰時期的中國難民》，頁20-21。

屋門聯不僅是表現作家歸返家鄉的渴望，也是以門聯所在地定位兒鄉、定位己身所在。

黃美之的成長敘事非篇篇見戰火，概以戰時後方環境為背景框架，透過兒少生活的重新記憶與敘事再現，體現民國時期人民的生存日常。如作家以「歌聲」串接故鄉童年記憶，乃至在南京讀大學、遷居臺灣、現時的各階段生活，孩童的歌聲如遠離兵荒馬亂的永恆存在，也是超越時空的牽引：「他們的歌聲竟如時光的隧道，牽引你回到有如鏡花水月的朦朧，充滿了希望與幻夢的童年。」³² 曲目從國歌、晚會歌、《倫敦橋》、反共歌曲到當下不知曲目的歌唱，每回總令作家停下手邊事神往靜聽。歌聲為作家帶來回歸的欣慰，從旁演繹了戰時中國連貫的歷史時空。戰時疏散的空間移動和成長記憶的時間渡越，顯示作家將個體情緒與意念逸離劇變時局之外的兩類路徑。意即作家的戰時成長敘事跨越了既存的物理空間和國族情勢等區隔限制，將漂泊意識寄託於戰局之外的事物，創構出專屬自我心靈和精神的棲息地。

心理流離是大眾經歷戰時環境的自然產物。³³ 中學時期的湘鄉與大學寄讀的南京、廣州等地，凝聚了作家因戰爭缺席或壓抑已久的青春記憶。這些地域一則為戰時離散的黃美之提供感性和牢固的記憶地點，一則襯顯人的精神原鄉不見得是原籍地或出生地，而可能為具安全感的成長空間。不過黃美之散文越是回憶戰火外的歲月生活，便愈彰顯原鄉物景與成長意識遭戰爭重創下所驅動的自我逃避。縱覽黃美之散文所寫的戰時中國，恆存一個戰火中的少年自我主體。其筆下戰線後方的成長日常，將中國戰時情境打造得更為在地化和日常化，與此同時凸顯戰爭對日常生活與人際網絡的深入破壞，而非僅是軍事暴力的生命掠奪。

作家寫的都是自己見聞所感，藉由書寫以盼有人理解她於戰時中國、戰後臺灣的生命經歷與時局變化。歷史學出身的黃美之認為：「文學是寫生活形態、社會的動向，以及當代人的所思所想。……從事文學工作的人，因有選擇題材和體裁的自由，又可充分發揮自己的理念和個性，這是否會替讀史和研究歷史的人，豎立一面鮮明的引導旗幟呢？」³⁴ 自詡為邊緣作家的黃

³² 黃美之，〈孩童的歌唱〉，《傷痕》，頁134。

³³ 蕭邦齊（R. Keith Schoppa）著，易丙蘭譯，〈結語 重建家園〉，《苦海求生：抗戰時期的中國難民》，頁329。

³⁴ 黃美之，〈我的文史緣〉，《歡喜》，頁238。

美之認為文和史是極為相關的，此刻的文學便是未來的歷史。她的文學記錄個人生命的獨特面貌，更是對時代的見證與評述，一如作家自言「我的散文寫的都是我的所見所聞所感」。³⁵ 近代戰爭下的民國圖景和個人記憶，是史學出身的黃美之戰後寫作的兩大基礎，也是背景設定，回應生命敘事同具個人和社會層次的意義。因此，固然其散文趨向打造出戰火之外的桃源空間，卻不只是表述作家對年少思緒或記憶的美好懷舊或是心理失衡，也能相對顯現作家生存的特定時局與敘事識框——中日戰爭乃至國共內戰及其在臺復員生活的戰時日常史，與戰爭遺緒下創傷意識與成長記憶的敘事互構和自我理解。

三、禁錮與傷痕：社會內戰下的身體與主體

戰後臺灣戒嚴時期的白色恐怖是特殊的內戰情境，關乎國共內戰與全球戰的雙戰結構，各方在一共有空間裡以隱晦的制度暴力爭取主宰性。³⁶ 來臺不及一年的黃美之1950年因孫立人勢力遭當局整肅，以洩漏軍機罪名與姐姐聯袂入獄，是內戰情境中非典型的受難者，也是被戰爭之框排除的零餘主體。本節由作家散文對受難者身體、主體意識與夢境幻象等敘事角度，探討女性身心禁錮與創傷敘事之樣貌。

（一）受限的身體：非典型政治受難者

法國社會理論家傅柯（Michel Foucault）以戰爭狀態類比社會無所不在的權力關係，社會內戰是複製戰爭中的不對稱力量關係。傅柯的討論讓戰爭延伸運作於個體生命及意志，黃美之散文的創傷敘事正好能回應傅柯對規訓權力與生命政治的關注。³⁷ 1950年服務於國防部女青年大隊的黃珏、黃美之姊妹因俄國間諜案獲罪，判刑十年，期間在臺北延平南路的南所（國防部保

³⁵ 明鳳英，〈不與紅塵結怨的烽火麗人——黃美之〉，頁199。

³⁶ 政治暴力最重要的辨認特徵在於加害者與受害者之間權力結構極度失衡，而侵害的範圍往往超越生命剝奪或肉身傷害。彭仁郁，〈「不要碰政治」？——轉型正義療癒工程的心理學介入〉，《本土心理學研究》57期（2022），頁33-34。

³⁷ 傅柯討論生命政治的目的之一，即是反省政治理性與政治權力濫用之間的關係，個體生命作為權力分析的對象。Michel Foucault, "Power". *Volume 3 of Essential Works of Foucault: 1954 - 1984*, trans. Robert Hurley et al. ed. James D. Faubion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0), pp. 201-348.

密局臺北看守所)和桃園蘆竹的天牢(國防部保密局桃園感訓所)服刑。姐姐黃珏由此體認一九五〇年代臺灣社會是個恐怖世界,姊妹兩人的冤獄更間接造成父親抑鬱病終。³⁸ 黃美之與姐姐黃珏於1960年獲釋,但仍是被當局考管的「新生份子」,歷經國家機器偵查、起訴、審判與服刑等完整過程後,持續接受政府的監控和隔離。³⁹ 黃美之戰後在臺灣的工作經歷與政治受難,演繹了流亡主體短時間內為國家戰爭之框吸納與排除的非典型個案。而她以身體感官詮釋受難經驗的書寫,則留下監牢生活的實錄,並體現流亡主體被內戰秩序排除的歷程細節。

散文集《傷痕》卷一名為「我的傷痕」,其收錄的〈囚禁〉、〈夢影親情〉、〈六月雪——我的申訴〉、〈幽谷足音〉四作,為黃美之對此段政治創傷的敘事系列作。關於《傷痕》書名的命名,她說明:

我雖名之為「朦朧集」,似乎也不妥切,躍昇出版社編輯施映麗女士,為這書命名為「傷痕」,我覺得被她抓住了要害似的,原來我的傷痕是很深的,只是用後來的歡樂努力的掩蓋著,映麗給我機會重新正視那段受創的歲月,也給了我一種重新面對自己的勇氣。⁴⁰

「朦朧集」表徵了作家將創傷記憶置諸腦後和無法言明的複雜意念,作為旁觀者的編輯則掌握諸篇意旨改名為「傷痕」。對此,作家認為被抓住了要害,以新書名作為契機重新省視受創歲月。卷一詩作〈囚禁〉:「任那黑色的命運瘦馬 拖著一輛命名『十年』的沉重破車 顛躓在心之荒野」⁴¹,字句沉痛刻劃入獄十年經歷的個人感懷,直言內心困境。詩作首尾皆以「一直一直 一橫一橫 鈍的銳的」字句具象木柵監牢的禁錮,⁴² 詩句前後的重複置放

³⁸ 朱浚源訪問,吳美慧紀錄,〈黃珏女士訪問紀錄〉,陳三井、朱浚源、吳美慧訪問,吳美慧紀錄,《女青年大隊訪問紀錄》,頁61-62。

³⁹ 「新生份子」係指「判處徒刑執行期滿或假釋出獄,以及受緩刑之宣告或受感化教育期滿」的匪諜罪犯。李禎祥,〈白恐時期的特殊份子與考管〉,《臺灣史研究》30卷3期(2023),頁115-118。

⁴⁰ 黃美之,〈後記〉,頁234。

⁴¹ 黃美之,〈囚禁〉,頁9-10。

⁴² 旅美華文作家周恩評述〈囚禁〉詩句描繪了鐵窗意象。周恩,〈無限的思念——憶紀剛、王藍、黃美之〉,《文訊》423期(2021),頁112。

亦比喻此受難經歷對作家生命的夾擊，顯見此詩對《傷痕》創傷書寫的定調和控訴。

寫於1988年加州的〈六月雪——我的申訴〉敘寫作家接受連日訊問、審判和入獄的過程，此文多見國家機器隨時隨地對未定罪者之個人身體、話語的管控。作為人類生物存在的身體，是權力進行控制、識別與再生產的客體。⁴³ 黃美之敘述自己與姐姐「被安置、留住」於保安司令部眷區，身旁各有人「陪伴」，接受連日訊問與被要求對旁聽訊問的長官佯裝未見等，等同是完全封鎖個體內外認知、行動，甚至是感官運作的可能縫隙。正式受審後的移送情景則是處處狹窄逼仄，由司令部小房間轉至一小巷裡小門後的小廳等候，直到被看守推入鐵門後的小房間。作家在短程移動過程內連續用了數個「小」字，只有形容鑰匙時才用了大字，她就像一個被國家機器運送、收編、宰割的物件，沒有任何權利：「送去保密局監禁，真正像被人塞進水桶內懸在井裡吊著」，⁴⁴ 不斷被塞入迫人的狹隘空間內而手足無措，作家寫道「整夜我和姐姐都緊緊的抱在一起，對我們自己的存在已深感懷疑」⁴⁵，鐵門後的小牢像是模糊恍惚的幻境，禁錮了黃美之的身體和心靈，令人懷疑自我存在；〈獄中間話〉同樣描寫審訊移送的封鎖過程，然可另見身陷囹圄的背叛感嘆：「心中很覺委屈，想自己高中時便是三民主義青年團團員，從小便敬愛蔣委員長，忠誠愛國，但現在竟優待共產黨，反視我們為叛徒，真令我們難堪。」⁴⁶ 此段文字道盡作家內心的不平、對社會角色的困惑，以及內戰流亡者與國家體制之間相生互依的脆弱性。⁴⁷ 〈六月雪——我的申訴〉、

⁴³ 布萊恩·透納（Bryan S. Turner）著，謝明珊譯，〈社會學與身體〉，《身體與社會理論》（臺北：韋伯文化，2010），頁54-56。

⁴⁴ 黃美之，〈讀《牛鬼蛇人》的前後懷思〉，《馬丁尼酒與野火》，頁32。

⁴⁵ 黃美之，〈六月雪——我的申訴〉，頁28。

⁴⁶ 黃美之，〈獄中間話〉，《歡喜》，頁210。類似的感懷，另見作家記敘共產黨員蔡孝乾、馮幼樵在臺獄中經歷。「政府政策突然改變，要利用他們的匪情知識，開始優待他們，……他們在牢中總共約二年，就獲得了自由，並有工作和一定的地位。我和姐姐兩個真正從小就忠於黨國領袖的人，卻還在牢中蹲，也真是一種諷刺。」參見黃美之，〈讀《牛鬼蛇人》的前後懷思〉，頁36。

⁴⁷ 楊孟軒指出國共內戰下流亡來臺的人，於戰後成為國家統御下原子化的個體，內化獨裁政體的壓制並與之相互依存，形成「非神聖的聯盟」之流亡群體關係。《自由中國》正呈現1950年代外省人與國民黨政權於此關係中的緊張。楊孟軒著，蔡耀緯譯，〈戰時過客〉，《逃離中國：現代臺灣的創傷、記憶與認同》（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23），頁123-135。

〈獄中閒話〉雖未對服刑處所桃園天牢與生活有所刻劃，卻得見1954年中影電影《歧路》上映、孫立人兵變事件、政府匪情研究等局勢。這些獄外社會的政治動態除顯示國家管控持續緊縮外，亦窺見被囚作家對國家權力壓迫人民身體和思想的敏銳感知。

1960年作家移住延平南路保密局看守所等待釋放，卻在出獄前得知父親病逝。父親離世的打擊讓甫獲自由的姊妹兩人毫無喜悅，只得昏沉的隨母親回家，三人疲憊至極甚至陷入病症：「到家後第二天，母親即病倒在床，黃珏身心都已十分脆弱，我則臉上長了白斑，甲狀腺機能亢進，兩手顫抖不能自己。」⁴⁸，首述入獄經歷的〈六月雪——我的申訴〉存在強大的壓抑感，若再扣合〈夢影親情〉返家段落的記述，則又能看出作家不得親人諒解的苦悶和孤獨。個人身體雖獲自由，但心靈仍被禁錮於政治創傷的記憶中，邊緣且孤寂；此外，文友張錯敘述黃美之的遭遇是「囚禁不只是犯人，血肉相連的親屬也相對被『囚禁』」，不單是當事人，連帶囚禁的還有被卷入紛擾的亡父病母，此點尤令作家心生揮之不去的負罪感，更添倖存後愧疚的多重創傷。⁴⁹

監牢生活對作家而言是幽谷，也是荒寂的戰場，傳遞生死訊息的看守腳步聲迴盪牢門：「回到了那曾經慘烈戰爭的戰場，戰場雖已是一片寂靜與荒蕪，但在記憶裏，仍是硝煙瀰漫，仍有號角在吹，而我所聽到的，卻總是一陣急促的腳步聲，從幽暗的角落響起。」⁵⁰ 黃美之將桎梏生活視為戰場，緣於因政治派系鬥爭無端獲罪的她，芳華之年便經歷社會內部的權力鬥爭，體悟個體或群體之間隱蔽且廣延的內戰競逐。〈幽谷足音〉對十年監牢生活有詳細的外在環境與內在情感描寫，久居十年的桃園感訓所監牢是曬穀場東西兩側的橫屋，以木柵隔成監房，房門極矮，進出都得低頭，房內則是簡陋的木鋪板與泥地。整體空間雖不完全封閉，然身體活動是極感壓迫的：「站在那木鋪板上太高，坐下來必盤腿，所以差不多都是躺著。」⁵¹ 長期監禁已令人失去自由，日常更被施予非常態的身體活動限制，使人逐漸對痛苦麻木、意志陷入頹廢。

⁴⁸ 黃美之，〈六月雪——我的申訴〉，頁31-32。

⁴⁹ 張錯，〈回眸〉，D3版。

⁵⁰ 黃美之，〈幽谷足音〉，頁33。

⁵¹ 黃美之，〈幽谷足音〉，頁56。

身心長期處於強大壓力的抑制狀況下，黃美之姊妹牙齒腐壞、營養不良而外出就醫，姐姐黃珏甚至因肺病住院，黃美之則患甲狀腺亢進。病痛讓兩人喪失身體所有權，並表徵國家暴力下身體被剝奪正常保護的樣貌，呈示身體失調的創傷癥候。⁵² 黃美之拘留延平南路就醫期間，雖得以短暫接觸外面世界，但人已變成情感抽離、逃避的麻痺樣態：「我向醫官招手是我本能的不願人那樣對我憐恤感嘆，因為我已進入不會悲哀，不願接受同情的階段。」⁵³ 黃美之面對他人而有意疏離、停緩自己的身體知覺和反應，呈現自我閉鎖的異化狀態。於此，作家顯現遭遇創傷後主體毀壞的敏感遞減狀態，從世界退縮後的僵固表現，彷彿周圍環境與己身無關。事件之所以成為創傷，是因為創傷時間快過言語時間的結構，黃美之對獄中所見所聞的僵化反應，恰顯現創傷當事人的論述邏輯尚未成形的受創時刻。⁵⁴ 面對永遠不能獲得自由的恐懼及焦慮，黃美之形容有如被密網緊網，刑滿前夕姊妹兩人尤其像繃緊的弦：「到期不放的例子很多，這才是我和姐姐最大的恐懼。」⁵⁵ 這種壓力來自個體處於長期禁錮的傷害，從外界送來的慰問品雖能舒緩身體的侷限感，一旦慰藉情緒褪去則愈加激發對自由的渴望，這種情緒焦慮尤顯於刑滿的第十年。

黃美之散文曾描寫殘疾人士「癱轎」照顧的社會現象，恰回應了戰後作家身陷囹圄無法自在行動與為人遺忘的痛苦，表現固著身體的記憶傷疤：

當時我們聽到這種敲木棍和大聲的喊叫，那會想到這些不能自由行動，和被人遺忘的痛苦，反覺他們那樣大聲喊「要恰飯啦」很滑稽，毫無憐恤之心。曾幾何時，自己也躺在木板床上，在一種狹窄的局面中，等人送飯來吃，肚子是常餓的，也相信除父母外，沒人記得我們了，因此想起了坐癱轎的人，又氣又好笑。⁵⁶

⁵² 身體感官所有權的喪失可視為一種身體異化。換言之，對感官實踐施予限制的疾病也是讓人喪失身體控制力的異化。布莱恩·透納（Bryan S. Turner）著，謝明珊譯，〈差異的本體論〉，《身體與社會理論》，頁299-300。

⁵³ 黃美之，〈幽谷足音〉，頁46-47。

⁵⁴ 創傷的出現往往快於認知的時間結構，故創傷效應具與時遞延的特性，當事人往往事後才以各種形式重新詮釋創傷事件。李秀娟，〈歷史記憶與創傷時間：敘述日裔美國遷徙營〉，《中外文學》41卷1期（2012），頁17-18。

⁵⁵ 黃美之，〈幽谷足音〉，頁62-63。

⁵⁶ 黃美之，〈若果是戲——風雨姐妹情〉，《馬丁尼酒與野火》，頁274。

黃美之成年後遭監禁所使用的木板床如童年時所見的癱椅，回憶中的癱椅和喊叫聲成為戰時正常人與非正常人的差異、限制表徵。兒時作為正常人觀看異常他者的自己，如今竟成了自己一生信服的國族體制所排除的零餘者——政治犯。青春期見證的殘疾人士，成為自己戰後處境無能為力的另類寫照，這令作家姊妹倆心感氣憤又嘲諷；而引文中無法動彈只得敲打喊叫的他者幽禁侷限，則比喻邊界兩端受囚作家與當局政權的權力不對稱。

雖然黃美之身體與心靈受到諸多限制，但她的記憶和視線卻不單記住、看向己身和獄友，也朝向木欄外受限的眾人——保密局看守：「看守們真正有如老友，他們常說他們自己也是在坐牢，每天這樣陪著我們坐，不同的，祇是他們坐在木欄外，我們則坐在木欄內而已。」⁵⁷ 若言黃美之是國家自體制內剔除的政治受難者，這群看守則是置身權力邊界上自願被關之人，兩方長久相處積累了互助同理的關係，減緩作家身陷囹圄的磨難。除了相伴的看守，同一牢房內待過情報局的鄒大姊、保密局前輩、孫立人嫡系部隊新一軍眾人及家眷、零星落難入獄的蒙古空軍與俄國水手等都是政治受難的同路人。這群人不分階級、性別與國籍，顯像了白色恐怖的受害群體之外，另表現出例外狀態的剝奪情境之權力劃界及其歸屬同理的特殊人情，此亦為黃美之創傷書寫的特殊用筆。這些人物顯現戰後臺灣的政治創傷並非孤立的「我」的事件經驗，黃美之的傷痕主體在此中現身，連帶呈現當時受難者們的共同處境。

（二）空間與物：主體意識的調節

身體為主體的經驗源頭，涉及與環境互動之場域與媒介，連結個體與社會，以及銘刻社會結構、時代症狀。研究者即就白色恐怖女性受害者的生命證詞，解析監獄生存空間中被剝奪的裸命狀態，失調與失序的身體為痛苦的癥候與記憶。⁵⁸ 以黃美之的狀況而言，生存條件的失調來自時間作息、身體行動、生活空間、物資供給的被監看、被剝奪狀況。漫長十年監禁於狹小

⁵⁷ 黃美之，〈麵和我〉，《歡喜》，頁180。

⁵⁸ 研究者李淑君以遭判刑的女性白恐受難者為研究對象，由口述訪談、報導文學、生命敘述等素材，探討監獄禁錮下的身體經驗。黃美之於此文中僅被列名，未做其文本論述。李淑君，〈「例外狀態」下的「失調姿態」：白色恐怖監獄中的女性政治受難者的失調身體〉，《淡江中文學報》38期（2018），頁113-148。

牢房，這種時間與空間的巨大落差給予作家極大打擊，自救之道是擴展主體存在的意識空間。作法其一為延展自己的意識視野並盡可能思考，不讓日復一日的監牢生活麻痺心智、模糊時間流逝，以證實我的主體存在；其二是藉由可盛裝的物品裝載記憶、情緒，以存有並延伸主體的意識空間，供給自我面對苦痛的心理調適機制。前者如〈幽谷足音〉將手伸出窗口縫隙，獲取外界的自由氣息：「颱風來時，我們會把手伸出去，去碰觸那外界的狂飆，因為這時我們會感到興奮，會感到自己的心仍在跳躍，不是死了的人，還在活著。」⁵⁹ 藉伸出牢獄窗外的手感覺風動以激化感官，窗外的世界為作家提供生命氣息；抑或憑藉視線所及的事物發想生活願景，如向風而行的飛機、房門前水溝或者好心看守送來的蛤蚌，概被作家聯想為通往外界的路徑，表現裸命狀態下的存在意識與信念維繫。⁶⁰

後者以可盛裝的物品作為裝承主體記憶的意識空間，例如〈我的紅色塑膠番茄盒〉透過番茄盒裝載牢獄生活聽聞的戰時經歷、生活苦難與各式情感，猶如神力無邊的阿拉丁神燈收納所有牢內的眾人生命：

臉盆正中放著我的紅色塑膠番茄盒，沉甸甸的，因為，盒子內，有心、有淚、有情、有血，還有英靈。我下房來，跟著木板鞋，想著從臺北去桃園也是很遠很遠的，我的空間得以延伸，何況我的番茄盒內，更是風起雲湧的故國神州，面對悠悠歲月，我端著我的盒子盒子，四平八穩的走向鐵門，如夢似幻。⁶¹

番茄盒內裝著自己、獄友們甚至看守所相關人士的破碎的心、時代劫難與為

⁵⁹ 黃美之，〈幽谷足音〉，頁52。

⁶⁰ 阿岡本提出「裸命」(bare life) 概念構築當代生命政治，意指不被任何法律保護，政治身分被剝奪，僅剩生物存在的赤裸狀態。政治犯作為國家所排除的人而被收回公民權與人權，亦被塑造為國家的敵人，餘下的生物生命也被控制。因此，裸命不只是單向度的管控，也被用作是建構權力核心的工具。研究者邱彥彬另指出裸命的存在暴露「生命政治裂縫」，遭受生命權力部署壓迫的裸命，反倒見證政治決斷無法再行化約的無能，而挑戰生命權力的部署。阿岡本(Giorgio Agamben) 著，趙文譯，《無目的的手段：政治學筆記》(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2015)，頁37-46；邱彥彬，〈在「我可以有一件襯衫」之後：論生命政治的失能與裸命的大能〉，《中山人文學報》32期(2012)，頁137-141。

⁶¹ 黃美之，〈我的紅色塑膠番茄盒〉，《不與紅塵結怨》，頁32。

國奉獻的青年生命，故國的風起雲湧是盒內眾人顛沛流離的共同時代記憶。身為受刑人無法走出囚牢，只能憑藉想像、記憶或物品擴大心靈意識的空間，追求自我救贖；前述引文更見黃美之進一步描繪中國人的集體記憶，寄託國族層次的傷痛，以政治受難者的立場溫情的洗滌大眾傷口。她沒有被憤怒淹沒，對外指控任何加害者，而是將目光回看相似經歷的我群，牢獄內的囚犯和牢獄外的看守管理人都都是中國戰爭遺緒的受難者。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儲藏、保存的容器除了是作家對記憶的隱喻或寄存處，內裡存藏物往往超越器具體可納的空間及意涵，而不只是個人記憶。恰如黃美之將記憶比喻為水晶盒子，與盒內所藏的變化萬千：

記憶像一隻水晶盒子，偶爾會瞥見盒子內映著斑斕的彩色，隱約的形象，心境好時，滿盒子內是錦繡雲霞，心緒低沉時，便只見水晶內一片慘白淡灰，若果真想記起一件事，便要打開盒子去搜尋，卻也不見得有所期望的結果，這倒也罷了，只怕記錯了，也會害死人的。⁶²

天然生成的水晶本具聚焦折射、傳遞轉換等延伸效能，由此襯顯藏在盒內的記憶會隨回憶主體而變化形象，甚至意涵上產生移動轉變。即便仔細回想，記憶也不見得如主體期望般呈現，且不同主體對同一事件會有相異記憶，記憶深淺也不一。由引文可知黃美之認為記憶是不可靠的，而書寫就成為她打開記憶之盒的方式之一，雖不見得呈現全盤事實，但相當程度表達作家記憶當下的情感。而原本抽象、模糊的記憶亦透過具體的物品聚攏、匯聚，如〈繁綺舊夢〉以茶食盒連結戰前太平安穩的童年記憶，茶食盒化為灰燼消失則隱射時代景況的動盪；或如〈非常雞心〉以隨身桃形項墜回首初中以來乃至美國定居的生命動亂，串聯母親與故人軼事的感懷。收納空間越有限、珍貴，存儲其內的事物就越顯其價值。⁶³ 雖是不同物品，但是散文借喻的形體樣式概為可關闔的小物，如前文所述之茶食盒、照片項墜等，從而體現作家對記憶的珍視。

⁶² 黃美之，〈禁錮中的記憶〉，《深情》，頁150-151。

⁶³ 人的記憶是空間匱乏的，故記憶存放的甄選關乎其內容價值。阿萊達·阿斯曼（Aleida Assmann）著，潘璐譯，〈第五章 記憶的箱子〉，《回憶空間：文化記憶的形式和變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頁133。

將記憶比擬為物品或透過物品存放記憶、時代經歷的敘事方式，尤其可見於作家重述戰後十年囚禁光陰的篇章。記憶和時代之外，這些小物形態也應和黃美之當下境遇。〈我的紅色塑膠番茄盒〉敘述作家暫囚臺北時所收到的塑膠盒，盒上描繪的翠綠葉帶來一絲生命氣息。研究者指出與作家生命原無任何關聯的盒子，成為維繫其生命存續、感官認知的重要寄託，反襯出白色恐怖的政治冤獄創構流亡主體的加害情境。⁶⁴ 這種藉由外在物品聯繫主體內在創傷的轉喻，同見〈失落的夢境〉所寫的手提包：「因手提包內有我唯一的身分證和所有的旅費。……失去的手提包則正是我十年的寶貴青春歲月。」⁶⁵ 手提包直接影射囚禁期間自己隨身的小行李包，每回行李的收拾擺盪於移監或者釋放的兩端情緒間，行李內所收的身分證、旅費意指作家的身分認同與主體資產，象徵可以移動的主體資本。倖存者傾向在現實生活和夢境裡重演自己的創傷、殘遺的願望，呈現自我形成的心象鏡像。⁶⁶ 所以夢中總是遺失的手提包，正是顯現作家禁錮不得自由以及身分不被認可的處境，回應〈失落的夢境〉開篇所述——永遠搭乘不到的車子，無法離開監牢現境的困窘。

生存空間的剝奪為戰後臺灣白色恐怖受難者反覆陳述的主體經驗之一。⁶⁷ 〈黑蜘蛛〉內牆邊屋角的蜘蛛亦延伸出生存空間思考的正反意涵，其快速移動的動作甦醒作家凝滯的感官身心，為死寂的監牢帶來生氣，卻也相對提醒現實中濕冷監牢的人身禁錮。⁶⁸ 黃美之敘述婚後成為美國公民的意義，是表現一心追求民主和心靈的自我。⁶⁹ 而這漂泊異鄉的選擇正是歷經創傷後的一種倖存者選擇，對於生存空間被剝奪的主動反擊或是療癒，是作家

⁶⁴ 趙彥寧由黃美之〈我的紅色塑膠番茄盒〉析論政治冤獄流亡主體以感官轉喻創構主體的方式。本文除接續趙的論點，並另提出物品所直接對應的受難記憶，回應政治倖存者的書寫傾向和寄託國族傷痛的救贖心理。趙彥寧，〈流放的政權與流亡的身體：論五零年代公領域中的主體、物、與性／別〉，頁82-85。

⁶⁵ 黃美之，〈失落的夢境〉，《歡喜》，頁29-30。

⁶⁶ 夢是潛意識的產物，生命的痛苦經驗會使潛在思想活動變成績發的行動。西格蒙德·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著，賴其萬、符傳孝譯，《夢的解析》（臺北：志文，2004），頁531-532。

⁶⁷ 李淑君，〈「例外狀態」下的「失調姿態」：白色恐怖監獄中的女性政治受難者的失調身體〉，頁127-130。

⁶⁸ 黃美之，〈黑蜘蛛〉，《歡喜》，頁124-125。

⁶⁹ 黃美之，〈代序 細說從頭〉，德維文學協會編選，林采如譯，《世紀在回眸：北美華文作家短篇小說集》（臺北：米樂文化，2014），頁3-4。

對自我主體的復活。黃美之的散文寫作根源於創傷，包括漂泊離鄉、突來的入獄與親人永隔的種種經歷。其敘事顯現傷痕之於主體的潛伏性、延遲性和反復性，以及顯現社會內戰所施予無節制暴力的特徵，如繡花針刺入作家的心，傷痕久久不散：「十年的光陰如一枚繡花針，把這份希望絞著失望的情緒一縷縷刺繡在心靈的深處。」⁷⁰ 希望與失望是情緒表現的兩端，內戰時局迫使黃美之長時間處於兩端失衡的狀態，她的肉體雖無重大殘缺，但精神已顯現出意識失調的癥候。無論是視野的延展、小物的寄託，或者是生活中任一意象的敘事想像，實是黃美之藉以調節主體意識面對歷史創傷的用筆，在壓抑的記憶中尋找能加以控制或親身觸及的事物。

（三）創傷時間：夢境、幻覺與記憶

黃美之的散文不僅直接以「夢」命題，敘事段落更時常摻雜夢境或幻覺。她自言是依靠夢境打發幽暗歲月，更藉以比喻己身經歷、當下處境或者預示態勢發展。姐姐黃珏形容，黃美之言行常與幻想纏繞，作家也自述自己是做夢最多的人，夢境往往明晰，然夢的內容不盡然與自己相關；⁷¹ 她的自傳散文《傷痕》原名為《朦朧集》，除比擬入監猶如進入隔絕現實世界的混沌，也呼應生命傷痛烙印的愴然情懷，沉潛於自己營構之想像天地以療癒自我、追求平和的寫作基調。⁷² 散文集首篇〈夢影親情〉即以囚禁期間的一場夢扣連與父親相處的記憶與獲釋經歷，繫獄期間，夢不僅是存在夜晚睡眠時的夢，還有白天禁錮時的白日夢：「在監牢中無事可做，白天坐著做白日夢，晚上更是夢中有夢，這樣倒也打發了好些無聊煩惱的歲月。」⁷³ 由引文可知，「夢」是黃美之精神寄託的空間，也是精神狀態的參照，具有令自我

⁷⁰ 黃美之，〈失落的夢境〉，頁30。

⁷¹ 黃美之，〈靈夢〉，《深情》，頁146；黃珏，〈我的妹妹〉，黃美之，《馬丁尼酒與野火》，頁233。

⁷² 《傷痕》為黃美之出版的第二本散文集，其出版處女作《八千里路雲和月》序言即見她藉寫作撫慰自己，以不同的民族風貌創構理想世界、追求內心安寧的目的「只有對寫作，雖不能說是孜孜不倦，但尚能鍥而不捨。原因是我對時空的距離常有一份悵惘，一份愴然的情懷，只有握著筆時，不管寫真寫假，心中都會感到舒暢，感到踏實，所以從小就喜歡寫詩寫故事寫雜記遊記。……希望讀者們能從我筆下各種不同的民族風俗中，各種不同的山海裡，窺視出一個大同的世界。」參見黃美之，〈自序〉，《八千里路雲和月》（臺北：世界書局，1979），無頁碼。

⁷³ 黃美之，〈夢影親情〉，《傷痕》，頁11、16。

暫時遠離現時禁錮以保持平衡的作用。除了夜晚作夢，白日夢則顯現作家無時無刻受困，及對未來情景、過去回憶的想像與思考欲求，呈現近似幻覺般的存在。

此外，入監的意識更與諸夢境相互纏繞，令夢中的自己保持意識清醒，具備做夢的自覺，知曉夢的空間並非現實。如〈夢影親情〉的夜晚之夢敘述父親來接與姐姐在南京觀戲的自己，夢中作家便清楚知覺自己與父親已許久未見，故兩人對話皆是探問彼此現況。夢裡每個符號、意象都是象徵。⁷⁴ 出獄後，來到父親墓前祭拜的作家想起這場夢境，拿桂枝的小女孩、吉普車恰對應眼前除草少女和搭乘車輛，再也抑制不住心中悲痛與委屈而崩潰，此篇呈現內在被壓抑與反抗壓抑的聯想過程。夢根源於日常經驗的消化，繫乎主體願望實現抑或無法實現的精神活動，從而流洩心靈上個人情緒經驗的生命情結。⁷⁵ 〈夢影親情〉的夢與現實聯繫了中國與臺灣時空的作家生命經驗，展演了潛意識對父親的眷戀和身心禁錮的壓抑情緒，回應夢是清醒生活的延續，為主體經驗投射與生命態勢預示的象徵性形式。可謂作家創傷書寫的夢境或幻覺，是過去感官經驗與幽微意識的記憶碎片，也是戰時情境與個人真實的後遺與復返。

〈幽谷足音〉描繪作家移轉至桃園監所服刑，進入木柵監房的黃美之只覺五雷轟頂，眼前所見與前夜所夢一樣令人真假莫辨。作家初入此處閃現前夜的夢境，除了襯托自己驚魂未定，夢的聯想也呈現創傷敘事想像的刺入，突現的夢與夜晚聽到的腳步聲、開門聲共添夢境般的朦朧氛圍，介入監牢記憶的再現。夢境、夜晚足音、聲響一同破壞並混亂敘事時間的線軸，遮蔽並影響記憶再現，另形構出一種非線性的創傷時間。⁷⁶ 這種突入生活節奏且宛如白日夢的幻覺敘述，特別見於1960年3月刑滿釋放前夕的幾日記事：

⁷⁴ 西格蒙德·佛洛伊德 (Sigmund Freud) 著，賴其萬、符傳孝譯，《夢的解析》，頁333-337。

⁷⁵ 同前註，頁499。

⁷⁶ 研究者指出臺灣政治暴力創傷具有後延效應，包括創傷效應「後遺」與「延遲」的時間後延性結構。創傷生成的非線性時間之雙重意涵：一為創傷形成的多重時間性，意指創傷並非在承受暴力衝擊的當下顯現，而對主體內在秩序產生擾動；二是創傷憶痕的無時間性，意指去主體化的創傷暴力往往造成主體的缺席，創傷記憶傾向以非人稱感官經驗碎片的形式，凍結於無時間性的心靈之內。彭仁郁，〈「不要碰政治」？——轉型正義療癒工程的心理學介入〉，頁38-39；李秀娟，〈歷史記憶與創傷時間：敘述日裔美國遷徙營〉，頁13-14。

三月十二日，那天晚上，我睡了一覺醒來，神清氣爽的，卻聽到有人從那餐廳的後門進來，……當班的只有兩位看守，那晚的看守一位是徐昭湘，一位是姓陶的，兩人正在東橫屋男號子前面聊天，……但這時聽到一柄利劍砍斷門前的鐵鍊，嘩啦啦的落了一地，我知道我們門前是沒有鐵鍊的，就是男號子門前也沒有過鐵鍊，正覺十分奇怪，又聽到那似乎穿了一隻大木屐，狠狠一腳踢在門上，那門爆裂似的開了，我嚇了一大跳，如此大膽。我掉轉身來看，門仍是關得好好的。⁷⁷

此段文字特別標記當日日期與看守姓名，表現自傳記憶關於早期記憶懷舊凸點的時間訊息特質：事件發生的時間標籤、順序及主觀感，即特定的時間、人物與事件發生順序，以及當下主觀情緒的敘述。⁷⁸ 黃美之散文的創傷書寫往往包含事件時間、地點、人物、活動等情境細節，與當下主體內在情緒、意念的經驗脈絡，其敘事除了對應長期記憶提取的陳述特性，亦襯出此段經歷已匯融在生命內裡的深層狀態。

記憶是自我形成的依據之一，⁷⁹ 夢與幻覺則作為黃美之提取創傷記憶的書寫路徑，或說是一種新的感知生產。事後理應意識相對清醒的牢獄敘事，藉由閃現的夢境、半夢半醒的幻覺，交錯作家過去經歷與現時寫作的意識，而呈顯主體情緒、經驗與記憶的再組織。這種敘事方式表現了回憶進行中記憶召回時刻所發生的扭曲、變形和再評價的重構過程，也體現經驗與回憶之間的位移與變形。⁸⁰ 一九九〇年代末葉尋求冤獄補償的黃美之，波折中感嘆「政治上的圖謀，常會像謀殺案件一樣，要一塊塊拼湊起來，才能得觀全貌，而這種拼湊又需時間與各方的資料」⁸¹，政治風雨的牽連傷害未因刑滿

⁷⁷ 黃美之，〈幽谷足音〉，頁63-64。

⁷⁸ 葉怡玉，〈第七章 記憶〉，梁庚辰、周泰立主編，《心理學：身體心靈與文化的整合》（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23），頁237-239。

⁷⁹ 葉怡玉，〈第七章 記憶〉，梁庚辰、周泰立主編，《心理學：身體心靈與文化的整合》，頁247。

⁸⁰ 回憶根本上是對記憶的重構，面臨一個時間積極參與之心理動力的變形過程。阿萊達·阿斯曼（Aleida Assmann）著，潘璐譯，〈第一章 記憶作為「術」和「力」〉，《回憶空間：文化記憶的形式和變遷》，頁21-22。

⁸¹ 黃美之，〈將軍的委屈〉，頁103。

出獄而告終，晚年作家仍處身冤情的傷痛，真相仍是碎裂、仍待拼湊。這種破碎的主體樣貌一如她戰後散文對敘事線性秩序的打破，將異質的夢境拼貼介入事件的線性建構；一則呈現創傷情感對意識與回憶的邊界擴展，二則凸顯歷經長期壓抑，作家創傷延異的精神後遺樣貌。

若要探知作家的創傷根源，可由歷經波折於二〇〇一年領到冤獄補償金時，黃美之對無法挽回的青春和親人傷痛之悲嘆、內疚窺知一二。⁸² 因為黃美之在戰時中國及臺灣準戰時體制語境中「自由」與「親情」的主體匱乏、破滅，方生發出潛伏於潛意識的夢境或幻覺，以及形構記憶的非線性創傷時間等再現敘事。一九五〇年代的傷痛耗費近半世紀才獲政府正式補償，補償認可的遲到與申辦過程的煎熬，緣於政治、社會因素再度疊加、刺激著創傷情感的反覆延異狀態：「在中國總沒有一個自如的環境任由作者發揮，政治立場便是無形的緊箍咒，社會的觀念也可是無形殺手。」⁸³ 如同思考、記憶和語言一般，此多重時間形成的創傷亦是作家得以完就文學書寫和成為自我的存在。戰時中國乃至戰後臺灣情境的政治創傷和社會氛圍，致使作家散文表現情節反覆或時間紊亂的敘事樣態，除了反映作家國族認同價值體系的個人崩潰，也是映現不當審判、情治系統、軍事統治交錯之白恐記憶的主體抗衡。

四、結語：離散情境下的疾患與主體

二十世紀是戰爭不斷的百年。此間黃美之的生命際遇與記憶書寫，不單回應了戰爭離散情境，也刻劃重層離散情境對生存狀態與精神主體的影響，鬆動且重構了認同結構與歷史記憶。⁸⁴ 來自戰爭逃難與政治禁錮的離散

⁸² 黃美之姐妹的白恐創傷存有對親人的內疚情緒：「記得那天我和姐姐一同去領取我們十年的冤獄補償，領到後，我們竟沒有想像中的那種快樂，反而唏噓欲淚，有種憑弔的心態，憑弔我們留白的青春，憑弔我們父母的傷痛。」參見黃美之，〈金陵女兒——《厚生》精神的傳奇〉，頁66；「當我和妹妹無辜地被埋葬在那莫須有罪名的深淵之中時，是我的母親用盡她的心血、精神及智慧和體力，將兩個女兒自深淵中奮力拖出來，才得以解困。……母親曾為她兩個女兒，肩負起那麼沉重的苦難，就越發覺得愧疚、悽愴。」參見黃珏，〈傷痕依舊念母親，十年辛苦不尋常〉，黃美之，《馬丁尼酒與野火》，頁240。

⁸³ 黃美之，〈天馬行空〉，《深情》，頁179。

⁸⁴ 交融數種歷史與文化的離散情境，構成對集體歷史與共同記憶重新思考的可能。卡

經驗，賦予黃美之去疆域化的流動性視野與不安的感覺結構。她透過語言文字，讓個人的成長記憶得到反思敘說和社會化，更將政治獲罪的污名化之受害狀態轉為主動的自我述說，療癒重層離散下的無歸屬感。她自一九六〇年代以降的寫作素材，絕大部分來自中國抗戰、國共內戰及戰後臺灣白色恐怖的生命創傷，包括青春失落、家族流散、政治迫害，甚或是對中國人戰爭歷史世代的民國經歷感懷等。文學成為黃美之面對戰時離散生命經驗的表述方式，具有創傷主體強烈的經驗性及主觀性。一般瞭解的創傷大多來自戰爭或災難，連帶演繹出創傷歷史的否認、覺察、轉化等過程。⁸⁵ 黃美之散文的創傷書寫表徵的正是個體記憶無法脫離社會、政治、文化背景，與國族認同崩壞後個體的自我保存與重整，她以個人經歷陳述整個世代的故事。其文筆道出時代性的疾患，與個人記憶、歷史現實及創傷敘事相互黏著，形構另一內心療癒的戰場。

黃美之散文最早期的民國記憶來自原鄉長沙，那時已有日本空襲威脅，之後輾轉於南京、廣州過著求學兼避難的流散生活，學業未待完成又被迫渡海航臺，主體始終處於時代與個人雙重變動的移動情境。故作家的書寫立基於「戰時中國」的遺緒情境，形成一流亡主體，不斷消化戰爭對身分認知與生活方式的衝擊。民國戰亂下成長的黃美之，其散文恆存鄉關何處的不安詰問與放逐的錯位感，與原鄉的聯繫感作為強烈的象徵運作。中國社會大眾忐忑躁動的結構情緒與及時行樂的世代價值觀，致其散文營構一暫止戰爭極端時空的桃花源空間。戰爭的現身並非直接的暴力，而是在地化的日常影響，令作家關注個人存有狀態且追求個體安定。黃美之一九九〇年代接續出版的散文集，重述那些被消音的白恐記憶，回應臺灣社會的民主化改革。戰時成長和準戰時體制下作家的創傷記憶，雙雙解構了終戰前後國民黨政府建制的國族歷史，重塑被忽視且邊緣化的中國人主體性與微觀歷史記憶。

歷史世變與政治現實促使黃美之產生地理空間的位移、心理認同的轉向和自我敘說的建構，其離散意識具有永恆的原鄉失落和差異性覺察之主體心理，回首質疑了國族主義的均質性聯繫。承此意識，她的散文將個人生命史的回復作為創作核心，記憶成為媒介，結合了中日戰爭、國共內戰乃至臺灣

爾 (Virinder S. Kalra)、柯爾 (Raminder Kaur)、哈特尼克 (John Hutnyk) 著，陳以新譯，〈混雜與開放性〉，《離散與混雜》，頁152。

⁸⁵ 彼得·列文 (Peter A. Levine) 著，周和君譯，〈創傷面貌的轉變〉，頁52-58。

準戰時體制社會的時代語境。黃美之漂泊不安的成長敘事、戰時桃花源的營構，以及創傷敘事之受限身體、主體意識、敘事時空的混亂錯位，莫不對應戰爭遺緒所引發的心理失衡病徵。這種戰時疾患貫穿了海外華文女作家黃美之的戰後散文書寫，呈示「戰時中國」的歷史遺緒匯入作家的生命敘事，成為一種纏繞於島嶼，甚至遊蕩至海外的時代幽魂，打破生活與意識的秩序之軌。換言之，黃美之的散文敘事演繹了戰爭遺緒的跨境流動與文化延異，其民國歲月與戰後在臺受難經歷實為戰爭流亡世代的歷史創傷。作家的敘事另開拓對白恐政治犯的主體認識，啟動歷史傳衍的能動性，將個人創傷轉化為有意義的社會文化批判，體現去疆域化的認同衝撞與書寫生產。

引用書目

- 卡爾 (Virinder S. Kalra)、柯爾 (Raminder Kaur)、哈特尼克 (John Hutnyk) 著，陳以新譯，《離散與混雜》(臺北：國立編譯館，2008)。
- 布萊恩·透納 (Bryan S. Turner) 著，謝明珊譯，《身體與社會理論》(臺北：韋伯文化，2010)。
- 西格蒙德·佛洛伊德 (Sigmund Freud) 著，賴其萬、符傳孝譯，《夢的解析》(臺北：志文，2004)。
- 李有成、張錦忠，〈在文學研究與創作之間：離散經驗〉，《思想》17期(2010)，頁75-94。
- 李秀娟，〈歷史記憶與創傷時間：敘述日裔美國遷徙營〉，《中外文學》41卷1期(2012)，頁7-43。
- 李淑君，〈「例外狀態」下的「失調姿態」：白色恐怖監獄中的女性政治受難者的失調身體〉，《淡江中文學報》38期(2018)，頁113-148。
- 李瑞騰編，《2014台灣文學年鑑》，(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5)。
- 李禎祥，〈白恐時期的特殊份子與考管〉，《臺灣史研究》30卷3期(2023)，頁99-140。
- 汪宏倫編，《戰爭與社會：理論、歷史、主體經驗》(臺北：聯經出版，2014)。
- 周愚，〈無限的思念——憶紀剛、王藍、黃美之〉，《文訊》423期(2021)，頁110-112。
- 彼得·列文 (Peter A. Levine) 著，周和君譯，《解鎖：創傷療癒地圖》(臺北：張老師文化，2013)。
- 明鳳英，《她們的時代：民國女子訪談錄》(臺北：釀出版，2020)。
- 林果顯，〈戰後臺灣的戰時體制(1947-1991)〉，《臺灣風物》58卷3期(2018)，頁135-166。
- 邱彥彬，〈在「我可以有一件襯衫」之後：論生命政治的失能與裸命的大能〉，《中山人文學報》32期(2012)，頁111-144。
- 阿岡本 (Giorgio Agamben) 著，趙文譯，《無目的的手段：政治學筆記》(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2015)。
- 阿萊達·阿斯曼 (Aleida Assmann) 著，潘璐譯，《回憶空間：文化記憶的形式和變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
- 侯坤宏，〈戰後臺灣白色恐怖論析〉，《國史館學術集刊》12期(2007)，頁139-204。
- 范銘如，《眾裏尋她——台灣女性小說縱論》(臺北：麥田，2008)。
- 張鳳，〈思念烽火麗人 黃美之〉，《北美華文作家協會》，https://chinesewritersna.com/review/?page_id=20250 (2024.4.24 徵引)。
- 張錦忠，〈那陣風，吹向南方：一九五〇、六〇年代臺灣女作家在《蕉風》——謹以此文紀念黃瑀、黃美之姐妹〉，《文訊》434期(2021)，頁49-52。
- 張錯，〈回眸〉，《聯合報》(2012.11.16)，D3版。

- 陳三井、朱滋源、吳美慧訪問，吳美慧紀錄，《女青年大隊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
- 彭仁郁，〈「不要碰政治」？——轉型正義療癒工程的心理學介入〉，《本土心理學研究》57期（2022），頁3-83。
- 黃金麟，《戰爭、身體、現代性：近代台灣的軍事治理與身體1895-2005》（臺北：聯經出版，2009）。
- 黃美之，《八千里路雲和月》（臺北：世界書局，1979）。
- ，《傷痕》（臺北：躍昇文化，1994）。
- ，《不與紅塵結怨》（臺北：躍昇文化，1998）。
- ，《歡喜》（臺北：躍昇文化，2000）。
- ，《深情》（臺北：躍昇文化，2002）。
- ，《馬丁尼酒與野火》（臺北：躍昇文化，2011）。
- 楊孟軒著，蔡耀緯譯，《逃離中國：現代臺灣的創傷、記憶與認同》（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23）。
- 葉怡玉，〈第七章 記憶〉，梁庚辰、周泰立主編，《心理學：身體心靈與文化的整合》（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23），頁217-255。
- 趙彥寧，〈流放的政權與流亡的身體：論五零年代公領域中的主體、物、與性／別〉，何春蕤主編，《性／別政治與主體形構》（臺北：麥田出版，2000），頁79-97。
- 趙淑俠，〈生命是往前走的——淺談黃美之的《傷痕》和王仙的《情之鍾》〉，《明道文藝》253期（1997），頁158-162。
- 德維文學協會編選，林采如譯，《世紀在回眸：北美華文作家短篇小說集》（臺北：米樂文化，2014）。
- 蕭邦齊(R. Keith Schoppa)著，易丙蘭譯，《苦海求生：抗戰時期的中國難民》（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2016）。
- 賴俊雄，〈當代離散：差異政治與共群倫理〉，《中外文學》43卷2期（2014），頁11-53。
- Foucault, Michel. "Power". *Volume 3 of Essential Works of Foucault: 1954-1984*, trans. Robert Hurley et al. ed. James D. Faubion.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0.